

第 四 卷
(上)

改革与巨变

——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977—1982 年)

主 编 谭宗级 叶心瑜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长春

第四卷作者名单

顾问 邓力群

总主编 徐达深

副总主编 谭宗级 程中原 陈东林 许晨光

主 编 谭宗级 叶心瑜

撰稿人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杰之	王智理	田 蓓	叶心瑜	孙怀新
李 蓉	汤应武	许雅宁	刘宋斌	陈 夕
张 翔	张战伟	张永璠	郑雅茹	柳建辉
高远戎	黄如军	韩 松	程 晓	谭宗级

审稿人 谭宗级 叶心瑜 徐达深

1977年

提 要

1977年是我国在徘徊中前进的一年。

深入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行及其在各方面造成的危害是本年度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继上年之后，又分别发出关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证的第二、第三批材料，掀起了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群众运动。同时，全国普遍清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帮派体系，逐步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到上半年，全国政治局面趋向安定。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江青等“四人帮”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

华国锋制定的“抓纲治国”的决策及“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是本年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思想。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出版发行、宣传工作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继续得到肯定和沿用，中共十一大未能完成从理论和党的指导方针上拨乱反正的任务。这就使得当时政治生活和各项工作呈现着矛盾状态：一方面欲结束

“文革”造成的混乱，达到“天下大治”；另一方面求治的工作进展缓慢，整个国家发展难上正轨。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在此前后，他批评“两个凡是”，开了全党、全国解放思想的先导。拨乱反正的工作在重重干扰中艰难起步。

在经济领域，中共中央、国务院号召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并先后召开一系列会议，强调进行企业整顿，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恢复和发展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经过整顿，国民经济得到较快恢复，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发展，扭转了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

全国60%的职工十多年来第一次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7%，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由于华国锋等对“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的紧张形势认识不足，对经济建设中的“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清理，本年度经济工作发生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急躁冒进的错误。华国锋和中央有关部门对农业机械化和粮食生产，对石油、煤炭、钢、化二的生产等方面，相继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口号，并企图依靠所谓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推动国民经济的“新跃进”，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病态，造成了新的失误。

在科学教育文化领域，主要由于邓小平的领导作用，出现了全新的面貌。邓小平批判了林彪、江青等人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黑线专政论”，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由此，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开始扭转，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一大批被长期禁锢的文艺作品得到解放。在“文革”中被废弃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得到恢复。科学教育文艺

领域气氛趋向活跃，渐呈生机。

外交领域，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尚未改变，工作仍在徘徊中进行。8、9月之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南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访华，中南两党恢复正常关系。

1977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快的恢复，扭转了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农业生产虽然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没有完成原订计划，但由于广大农民的努力，大大减少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农业总产值1339亿元，比上年增长1.7%。工业生产逐步回升，某些方面还有一定的发展。全国工业总产值3728亿元，比上年增长14.3%。工农业总产值5067亿元，比上年增长10.7%。工农业产品产量：钢，2374万吨，比上年增长16%；煤，5.5亿吨，比上年增长13.9%；原油，9364万吨，比上年增长7.4%；发电量，2234亿度，比上年增长10%；水泥，5565万吨，比上年增长19.2%；粮食，28273万吨，比上年减产358万吨；棉花，204.9万吨，比上年有所减产；油料，401.7万吨，比上年增加9000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82.37亿元，比上年增长1.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432.8亿元，比上年增长7%。进出口贸易总额272.5亿元，比上年增长3.2%。国家财政总收入874.5亿元，总支出843.5亿元，结余31亿元。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乘胜前进》。社论指出，1976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我们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中国革命避免了一次大曲折，中国历史避免了一次大倒退，中国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灾难。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深远影响，正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这对于继承毛

主席的遗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是最可靠的保证。社论认为，最近，中央决定发表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毛主席在文章中说：“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们各项工作都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华主席在刚刚闭幕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提出在新的一年里，要深入开展揭发批判“四入帮”的伟大群众运动；加强党的建设，在全党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进一步把群众性的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推向新高潮。这是大治天下的四项战斗任务。对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的重要讲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必须努力学习好，宣传好，贯彻执行好。社论强调指出，深入揭发批判“四入帮”，是我们全年的中心任务。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把他们揭深批透，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还要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把“四入帮”揭深批透，把思想政治路线搞清楚，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我们的各项工作就一定能够搞好。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造成一个政治上生动活跃，经济上繁荣昌盛，科学文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人民生活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不断改善的崭新局面。我们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

1月2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目前最长的公路桥——洛阳黄河公路大桥通车。大桥全长3428.9米。

1月2日至6日 孟加拉国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陆军参谋长齐亚·拉赫曼少将访华。访华期间，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会见齐亚·拉赫曼少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齐亚

·拉赫曼少将举行会谈。4日，中孟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贸易和支付协定在北京签字。6日，《新闻公报》发表。

1月10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最近在北京会见了洪都拉斯马列主义共产党中央代表团。

1月10日至25日 全国煤炭工业学大庆、赶开滦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学习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贯彻落实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1977年的战斗任务，落实全国工业学大庆筹备会议的精神；总结学习大庆经验，交流贯彻“鞍钢宪法”，学大庆、赶开滦的先进经验，讨论如何建设和普及大庆式企业，制定建设和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规划；安排1977年煤炭工业战线的任务。来自各地的300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23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会议总结交流了煤炭工业战线学大庆、赶开滦、赶“十面红旗”，建设大庆式企业的经验，提出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规划和措施。会议命名河北省开滦煤矿等30个单位为大庆式企业，还通报表扬了130个学大庆的先进单位。会议号召全国煤炭企业和全国煤炭职工更高地举起“工业学大庆”的红旗，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掀起一个学大庆、赶开滦、赶“十面红旗”的新高潮，把“鞍钢宪法”的五项原则贯彻到企业各项工作中去；会议要求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坚持领导干部值班的制度，整顿好劳动组织；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考勤制等七项制度，节约原料材料，加强经济核算，关心职工生活。

1月11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又一大型的、现代化的综合性石油化工基地——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建成投产。

1月14日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会见利比里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阿·本·托尔伯特和以他为团长的利比里亚友好代表团。

同日 新华社报道：三十万吨乙烯工程在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建成投产。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亲自批准的重点建设项目，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乙烯工程。这项工程从1973年8月开始动工，至1976年5月建成，并且一次试车成功。

1月15日 中共中央调刘西尧任教育部部长。

1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交通部大批判组”文章。《一出反革命闹剧——“四人帮”炮制“风庆轮问题”的真相》。文章说，1974年“五一”节刚过，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全部采用国产机器和设备的万吨轮风庆轮从上海港启程，驶往欧洲，历时150天，在国庆节前夕返回上海。当时，“四人帮”借此事策划了一个阴谋。文章说，“风庆轮问题”是“四人帮”精心炮制的一颗反党炮弹，因“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而起，随“四人帮”的彻底垮台而毁，它是一出反革命闹剧，前后喧嚣两年有余。1974年初，风庆轮尚在重载试航阶段，“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蓄意制造事端，污蔑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是“崇洋公司”，点名批判交通部，并称“部的背后有中央的人”。他们挥舞“崇洋媚外”的大棒，是要把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打成“当代的李鸿章”。这是“四人帮”炮制“风庆轮问题”的实质和要害。但当风庆轮即将远航成功时，又恨不得把胜利成果一口吞下，一方面下令组织盛大欢迎和宣传报道，另一方面，又利用“风庆轮问题”继续向周恩来总理施放毒箭。于是，所谓“风庆轮问题”形成了一个高潮。一时间，被“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发表了连篇累牍的文章，以风庆轮为背景的电影、戏剧、小说、电视、广播也纷纷出笼，鼓噪什么“风庆轮是批出来的，斗出来的”，“远航权是争来的”，攻击有人“瞧不起国产的东西”，“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等大帽子也飞出来，妄图在四届人大之前整倒周恩来等，清除他们“组阁”的障碍。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毛泽东主席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四人帮”又一次把“风庆轮问题”搬上舞台，借此发难，但被毛主席制止，但“四人帮”仍私下布置一家电影制

片厂拍摄以风庆轮为题材的电影。文章指出，“四人帮”是扼杀我国造船工业的罪魁祸首，他们之所以借风庆轮大做文章，既是为了摘桃子，也是为了打棍子。为了发展我国造船工业和远洋运输事业，周总理制定了立足于发展我国造船业，但也不排斥在有利条件下适当购买一些船只的方针，以尽快结束我国远洋船队依赖租船的局面。“四人帮”对此大唱反调，大施阴谋。文章说，围绕着“风庆轮问题”展开的这场惊心动魄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我们党同“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的一个侧面。《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出：王张江姚反党集团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捏造什么“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等罪名，胡说有人不搞自己的造船工业，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他们利用风庆轮大做文章，既是摘桃子，又是打棍子，妄图证明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打倒了“四人帮”，“风庆轮问题”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

1月18日 康健民在银川逝世。康健民，甘肃榆中县人，1916年生。他于1932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战士、班长、排长、政治指导员、连长、副团长、骑兵团长、骑兵旅长、师长、副军长、军政委、军长、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中共核心小组组长等职。在中共九大、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他生前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部队副司令员，他还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1月19日 中共中央发出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决定，今年“五一”节前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动员全党、全国工人阶级，把工业学大庆的革命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普及大庆式企业面奋斗。这是实现华主席提出的走向大治的战略决策的重要步骤。通知指出，大庆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我国工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十几年来，大庆坚持“两

论”起家的基本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职工，坚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毛主席办社会主义工业的路线，全面贯彻“鞍钢宪法”；走出了一条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根本对立的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大庆，是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大学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典范，坚持了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技术革命和勤俭建国的原则。通知指出，工业学大庆，是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它必然会在政治、思想、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引起巨大的变化，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学不学大庆，是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是要不要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的问题，是要不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问题，是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方向的问题。从壮大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看，工业学大庆是一项十分紧迫的战斗任务。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毛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学习中央关于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揭狠批“四人帮”，抓好领导班子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增强职工队伍的革命团结，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搞增产节约，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掀起工业学大庆运动的高潮，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以优异成绩迎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召开。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必须加强领导，全面规划；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同志，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把工业学大庆运动像农业学大寨那样切实抓紧抓好。

1月22日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和以他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五次访华团。

1月24日 中共中央致电巴西共产党中央，对巴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彼得罗·波马尔、安瑞洛·阿霍约和中央委员若奥·巴蒂斯塔·德鲁蒙德遭巴西当局杀害，表示深切哀悼。

1月26日至2月17日 保尔·斯泰根主席率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代表团访华。2月12日，华国锋、李先念等会见了保尔·斯泰根主席一行。

1月27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中央军委最近要求全国各地区、各部队在1977年春节期间广泛深入地开展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活动。通知要求全国军民在开展这一活动中，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做好华主席提出的1977年的四项战斗任务。通知号召全国军民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掀起“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高潮。通知要求在全国普遍进行一次拥军优属和拥政爱民的教育，狠批“四人帮”反党乱军，破坏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破坏军政、军民团结的罪行。通知最后说，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做好民兵工作，搞好军民联防，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

本月 为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全国各地开展各种纪念活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彩色记录片在全国各地上映。《周恩来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摄影展览和照片画集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发行。北京和全国的报刊还发表了许多纪念文章、诗歌、照片、画刊。

本月 一批长期被“四人帮”禁演的优秀戏剧等重新和观众见面，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如歌剧《洪湖赤卫队》，话剧《豹子湾战斗》、《南海长城》，现代京剧《八一风暴》，现代豫剧《朝阳沟》，舞剧《小刀会》和评弹《蝶恋花》等。

2月1日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会见奈定·霍查部长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贸易代表团。同日，中阿两国政府关于1977年交换货物和付款的议定书、关于阿尔巴尼亚1977年使用中国贷款的议定书，在北京签字。

2月5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大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文章指出，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是今年的中心任务，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三个多月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但还不能自满，还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夺取更大的胜利。文章说，“四人帮”是一伙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为根本目的的反革命黑帮；是一伙对毛主席、对周总理、对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主席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有刻骨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极右派。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他们的路线，集中代表了这一切反革命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是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是敌我矛盾问题，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文章指出，“四人帮”在我们党内经营了多年，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从革命到建设，从理论到实践，从中央到地方，特别是在一些他们严密控制的地区和单位，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流毒很广很深。对此，我们决不能轻视，决不能低估。因此，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坚决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目前，全国各地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发展是好的，但不平衡，有的地方和单位还存在着领导落后于群众、落后于形势的现象，也有的地方和单位满足于前一阶段运动的成绩，没有注意把运动推向前进。文章强调，当前要把运动引向深入，关键在领导。各级领导要响应党中央的战斗号召，进一步提高对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的认识，以阶级斗争为纲，积极带领群众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

斗争中一定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果断；同时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抓好典型，推动一般；要注意党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同日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全国人民防空业务工作会议，第三机械工业部企业、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会议，国防科工委计划座谈会和科研、生产会议的代表，共800多人。

2月5日至11日 邓颖超副委员长出访缅甸。访缅期间，缅甸总统吴奈温欢宴邓颖超副委员长；邓颖超副委员长分别拜会了吴奈温总统、国务委员会秘书山友将军和吴盛温总理。

2月7日 华国锋公开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以《学好文件抓住纲》为题发表社论，首次在全国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早在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中共中央宣传口汇报时就指示：要审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1977年1月，华国锋在起草三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稿时，授意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观点写进去。2月3日，李鑫向写作班子传达汪东兴的指示：华主席的讲话要推进，先发一篇社论，把华主席讲话稿中关于“高举旗帜”的内容都要写进去。写作班子把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稍加修改移到社论里。这篇社论华国锋授意、由汪东兴组织审定，报华国锋批准，便于2月7日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名义匆匆发表。“两个凡是”的观点是华国锋这一时期思想的集中体现。提出“两个凡是”的用意，是为了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其实质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坚持下去。“两个凡是”的方针压制了思想解放，阻碍了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

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通知指出，在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有少数坏人制造谣言，甚至伪造华主席、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妄图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干扰运动的方向。根据这个精神，3月28日国务院下发第30号文件，指出，对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持逮捕法办。对少数罪恶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杀掉。广大干群一些要求拨乱反正的正确呼吁，被当作“政治谣言”和“反革命”行动，受到打击，造成了一些新的政治冤案。

同日 美国总统卡特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

2月15日 《人民日报》刊登“石油化学工业部大批判组”的文章：《把“管、卡、压”大棒同“四人帮”一道埋葬》。文章指出，“管、卡、压”是“四人帮”反对规章制度的一根大棒，他们挥舞这根大棒，破坏革命，破坏生产，妄图把社会主义企业搞乱，把国民经济搞垮，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张春桥公然提出“要建立没有规章制度的企业”，根据是“毛主席只讲过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讲过建立规章制度”，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明显歪曲和篡改。文章说，“反对管、卡、压”，是“四人帮”的“紧箍咒”。建立规章制度，加强企业管理，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问题。搞好管理，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就是要明显规定哪些是应该干的，哪些是不允许干的。“反对管、卡、压”这个口号，在“四人帮”那里，是个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它否定集中统一，否定无产阶级纪律，否定革命权威，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对资产阶级的规章制度，也要作具体分析，对其合乎科学的东西，也应学习。文章号召向大庆学习。文章说，大庆建立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一整套规章制度，生产搞得很有条理，很有秩序，很有规矩，很有纪律。大庆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建立合理的规章

制度，没有规章制度是不行的；有了规章制度，不严格执行也是不行的。文章指出，为什么大庆的规章制度“四人帮”反也反不掉？因为大庆的规章制度来自群众，来自实践，既反映了客观规律，又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大庆在执行规章制度中，不靠单纯的行政命令，而主要是靠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大张旗鼓地树立先进典型，大力表彰好人好事；还因为大庆的规章制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能适时而改，增添群众的新鲜经验，并且不搞繁琐哲学。文章号召坚决执行华国锋主席“依靠群众，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改进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的指示，在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以大庆为榜样，把各项规章制度认真建立和健全起来，加强企业管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2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恩格斯《论权威》〈节录〉。《人民日报》为此所加的编者按指出：恩格斯在这里批驳了无政府主义否认一切权威，主张绝对自由的滥调。“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竟然把一百年前已被恩格斯驳倒的无政府主义破烂货色重新搬出来。今天我们重新发表恩格斯《论权威》的节录，就是要以这篇文献为武器，进一步批判“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的谬论。

同日 中国和利比里亚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签署，两国政府决定从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2月20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铁路工作会议最近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主持召开的。28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20个铁路局和16个铁路分局党委的负责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20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华国锋、叶剑英等接见了与会代表，华国锋、叶剑英作了指示，纪登奎讲了话。与会代表们学习了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联系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破坏

铁路运输的罪行。会议认真研究了动员全党管好铁路，抓纲治国，大干快上的问题。会议指出，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全国要大治，工农业要大上，铁路必须做到畅通无阻，当好先行。铁路运输上去了，整个国民经济就活了，发展就快了。为此，必须全党动手，党政军民一齐努力，千方百计地把铁路运输迅速搞上去，把“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会议强调指出，管好铁路，必须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两个积极性。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进一步加强对于铁路工作的领导，要有一名书记亲自抓铁路工作，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经常督促检查。要在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铁道部门和地方公安部门密切配合，放手发动铁路沿线的广大群众和铁路职工，保卫人民铁路，认真把列车、车站和沿线的治安工作搞好。会议期间，一些铁路局和省的代表介绍了加强党的领导，学好文件抓住纲，抓革命、促生产的经验。会议提出，要苦战三、五年，把全国的铁路办成大庆式企业。为了建设大庆式企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要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抓好铁路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要在培养革命化的职工队伍上狠下功夫，把铁路职工队伍建设成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半军事化的产业大军；要走群众路线，建立一套管好社会主义企业的科学的规章制度。

2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教育部大批判组”文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容践踏》。文章指出，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以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的科学分析为依据的。1957年，毛主席对我国知识分子状况的分析是：知识分子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是少数；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对国家抱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但“四人帮”只要一提到知识分子，就任意给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他们把

旧教育制度和旧学校培养的学生混为一谈，从不作具体分析。文章说，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但“四人帮”竭力否定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四人帮”的一个干将大肆鼓吹所谓建国后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的谬论，是他们颇有代表性的论点。文章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与工农兵相结合，努力改造世界观，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们在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改造。“四人帮”鼓吹的“破坏论”，道理是反动的，事实上也是荒谬的。文章说，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而不是要打倒广大教师，相反，更要依靠其中的积极分子，团结广大教师。“四人帮”动辄斥教师为“右倾复辟势力”，甚至提出取消教师的荒谬主张，妄图创造一个取消教师而由学生自治的“典型”。文章指出，“四人帮”肆意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既破坏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又破坏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他们对知识分子极端仇视，百般诬蔑，根本谈不上半点团结；对他们来说，“教育”、“改造”，不过是“打棍子”、“戴帽子”的代名词。他们把“师道尊严”说成是教育战线的主要危险，煽动学生把教师当作“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来批判，对知识分子大搞法西斯专政。“四人帮”肆意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用“大棍子”打人，用“大帽子”压人，用“小鞋子”整人，致使广大知识分子欲干不能，欲罢不忍，左右为难，无所适从，极大地影响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积极性，妨碍了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发挥，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损失太大了。

2月24日 王猛任中共国家体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体委主任；庄则栋被免去中共国家体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体委主任的职务。

2月25日 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获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